

| 绪 论 |

一、语言张力与国家安全关系

自古至今，语言一直与国家安全的命运息息相关。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语言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更加显著与多样化，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当今不少处于弱势的民族语言正面临着全球化、互联网的强势语言冲击，存在着逐渐消失的危险。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数字鸿沟，数字鸿沟带来了语言间更大的不公平，并威胁着许多语言的生存。^①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目前世界上约6000种语言中有近半数在21世纪面临着毁灭的危险，甚至其主要原因是互联网的使用。恰是在全球化、互联网等要素的冲击下，不少语言正处于衰落状态，乃至濒危，怎么科学地保护我国语言，避免国家语言资源遭遇侵蚀、衰减和流失，成为一项非常紧迫的使命。

从国家角度来讲，它是否拥有丰富的语言资源，是衡量其实力的重要因素。随着全球化进程，国家建设与发展需要丰富而具有一定统一性的语言资源支撑。因此，国家语言资源的缺乏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李宇明教授指出，国家语言能力是一个国家处理国内外事物所具备的语言能力（包括国家发展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实际上，这对于世界上大部分人而言，国家语言能力缺失成为语言不安感和语言压迫感的原因。

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先生指出：“自古以来，语言文字问题始终关系

^① 李宇明：《信息时代的中国语言问题》，《语言文字应用》2003年第1期。

到国家和民族的主权，关系到公民的人权”。^① 近年来，不少语言实力缺失的国家都出现了语言冲突日趋增加的迹象，乃至呈现“蝴蝶效应”，酿成很大的社会动荡。我国也出现了类似事件的语言，包括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或国际关系的一些外国势力，吹响了“国家安全语言报警”。因此，如何正确处理语言与语言的关系，解决语言的矛盾，特别是防止语言和政治的使用，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安全问题。某些国家利用语言进行政治、文化渗透，并且愈演愈烈，花样不断翻新，构成对我国的严重威胁。

语言能力作为保证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是国家实力的一部分。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充分证明，语言能力不仅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且正在转化为一定硬实力。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语言文字的国家，要在独立自主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说服国际社会接受中国的崛起，今后我们将需要走更长的路和更艰苦、更细致的工作要做。只有语言有价值，才会被他国的人们学习和使用。历史上，汉语文化传播也因国家兴衰而起伏不定。2004年，中国政府出台汉语国际推广战略。该战略计划投资25亿元推广汉语，使国外汉语学习者达到上1亿人次，并在几年内在全世界建100所孔子学院推广汉语。从2004年到2014年底，已经有476所孔子学院遍布全球127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全球性平台。从理论讲上，拥有13亿多人口的中国，如若把汉语作为一种“语言武器”，其“杀伤力”远远超过英语。另外，“汉语热”也使中国再次面临攻击，一种关于中国的“软实力威胁论”正浮出水面。美国著名的智库人物之一乔舒亚·库兰茨克，在美国《新共和》杂志发表《中国在亚洲挑战美国软实力》一文中颇为露骨地宣扬他的论调。而且，他特别忧心中国政治和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并煞有介事地指出华盛顿的鹰派除了把注意力集中于中国潜在的军事威胁外，还应该注意另一种较为隐形的软实力威胁。在他看来，海外汉语学校的开办和汉语热的出现，中国日益增强的软实力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威胁”美国。

当今的中国乃至世界正处于全球化的时期。对于一个独立的民族来

^① 许嘉璐：《序言》，载周庆生：《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说,各个历史时期都存在母语安全的问题,特别是该民族的语言文化处于开放的历史时期。但是这一时期,文化帝国主义盛行,侵蚀一些弱小国家民族的语言,并演变成一场生存之战。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中指出,文化帝国主义包括几种可以互相转换的意思:“一,不平衡的信息流,即媒介帝国主义;二,(美国文化)对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和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的威胁”。无疑,全球化即美国化。互联网上90%的信息都是以英语流通,世界上除了英语母语国家之外,100多个国家都是以英语为第一外语;英语的影响可以说是遍及全世界。^①正如阿尔温·托夫勒所说:“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和金钱控制的年代,而未来世界的魔方将控制在有信息强权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②在制造全球化传播的能力上,西方具有我们没法比拟的高效传播手段、巨大的资本储备、丰富的运作经验、周密的网络体系和组织机构及由此形成的更广泛的国外受众。因而,在中国国际传播手段不足、传播经验不足的历史条件下,要说服世界接受中国,就必须以不很“政治”的形式积极参与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传播体系,在其中有理、有利、有节地对西方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干涉中国内政的舆论长期坚持最坚决、最不留情面的斗争,同时也要尽可能地选择西方社会能接受的“普世”形式,在其中用中国的元素和解释去影响、说服更多的国家及其人民理解和接受中国的发展。

二、语言与技术进步关系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文森特·莫斯科(Vincent Mosco)指出,与此前的许多技术发展一样,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数字化时代正将人类带入一个全新时代。

我们坚持认为,我们所了解的历史正在终结——我们正在迈入一个新

① 崔梅:《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传媒与母语安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② 阿尔温·托夫勒:《权利的转移》,刘江等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页。

纪元。我们坚持认为距离已经死亡，地理的限制正在减弱。我们认为赛博空间正在转变政治，也许正在终结不断变换形式的获取支持的日常动员方式，并向人们引介一个前所未有的电子民主和虚拟社区的时代。考量这些观点的价值当然是重要的，但是考虑到它们作为一种认知形式所具有的力量，我们同样需要理解它们是如何超越了事实根据，描绘出一幅让人无法拒绝的关于我们时代的图景。理解赛博空间的迷思性力量的这一侧面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所提供的景象，尤其是它所赞美的历史性断裂，使得人们很难注意到另一种看待问题的方式，即强调现在和过去之间的连续性。^①

当然，信息技术并不只影响政治、经济、科技教育，而对人类语言生活也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影响。网络语言是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它与大众媒体语言一样，都是媒介语言的表达模式。因此，网络语言并非特殊语言，而是与其他媒介语言一样是自然语言的变体。早在1957年，海德格尔就预言了“语言机器”对人类即将产生的巨大影响。他注意到了一种几乎不可逆转的趋势，日渐强大的技术正在长驱直入地进入人的内心。在这个“语言的处所”里，思想和实在得以汇合。海德格尔这里所谓的“语言机器”，即是以后出现的“计算机”。

语言机器通过机械的能量和功能，对语言中可能有的用法的模式预先做了规定和校准。总之，语言机器是——而且仍将是——现代技术对语言模式和语言世界进行控制的一种方法。与此同时，人们的印象却认为人是语言机器的主人。但事情的真相也许正相反，语言机器把语言统管起来，因而也就控制了人类的本质。^②

1984年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也推测到“计算机介入式传播（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简称CMC）是语言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③。

① [加] 文森特·莫斯科：《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一与赛博空间》，黄典林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

② [美] 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金吾伦、刘钢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③ Susan C. Herring, "Computer-Mediated Discourse," in Deborah Schifffrin, Deborah Tannen, and Heidi E. Hamilton, eds., *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1, pp. 612-634.

计算机介入式传播,网络流行语所承载的是社会功能,使得各种变异性的语言不断出现。^①从近年来的网络语言来看,汉语新词所占的比例呈现增长趋势。

网络时代的语言扩张,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如语言学家索绪尔谈到语言流变的必然性和基本方式。他认为:

一方面,语言处于大众之中,同时又处于时间之中,谁也不能对它有任意的改变;另一方面,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在理论上又使人们在声音材料和观念之间有建立任何关系的自由。结果是结合在符号中的这两个要素以绝无仅有的程度各自保持着自己的生命,而语言也就在一切可能达到它的声音或意义的动原的影响下变化着,或者毋宁说,发展着。这种发展是逃避不了的;我们找不到任何语言抗拒发展的例子。过了一定的时间,我们常可以看到已有了明显的转移。”^②

以索绪尔的观点来审视网络语言变迁,清晰地发现网络语言的发展对现实空间文化传承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1) 网络语言重构了人们的语言交流空间。网络语言推崇自我、追求个性、花样翻新、语出惊人,使语言洋溢着鲜活的生命力。那些品位高雅、机智俏皮的连珠妙语和文字游戏展示了高学历、高素养网民们的智慧与才情,他们所创造的幽默是对平庸、枯燥、刻板生活的“温和打击”。与此同时,网络语言追求新奇快捷、幽默调侃以致无暇顾及语言的规范,错字别字、怪词异句及恶搞文字游戏举目皆是,这无疑是对传统语言的一种强烈冲击,甚至严重颠覆了传统语言的规范性。

(2) 网络语言是个性化展示的平台。网络时代的到来,对于媒体、新闻记者乃至每个人而言都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更为普通百姓消解权势打开了方便之门。如今,网络空间中充斥“独创”的语言、“拼贴”的图片、“恶搞”的动作,就是个性展示的结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传统社会来建立的生存体系。

① 侯敏、周荐等:《汉语新词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013年。

② [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3—114页。

后信息时代的根本特征是“真正的个人化”。这里的个人化，不仅仅是指个人选择的丰富化，而且还包含了人与各种环境之间恰如其分的配合。其间，机器扮演的角色是使这种配合能够接近没有机器时的自然与和谐。这就要求机器对人的了解程度和人与人之间的默契不相上下。人不再被物役，而是物为人所役。在科技的应用上，人再度回到个人的自然与独立，不再只是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单位。信息技术的革命将把受制于键盘和显示器的计算机解放出来，使之成为我们能够相互交谈、共同旅行，能够抚摸甚至穿戴的对象。这些发展将改变我们的学习方式、工作方式、娱乐方式——一句话，我们的生活方式。^①

在网络世界中，普通百姓能享受现实生活中没有的或只有明星或有权势的人才拥有的美貌、金钱、权力、荣耀、力量、才华等，可以享受没有权利的生活，这样会导致部分传统权力话语的消解。网络的宽松环境使男女能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男女能隐匿自己的性别，甚至能改变自己的会话角色等引起的性别语言的变迁，这对传统文化也是一种强烈的冲击。

(3) 网络语言推动了人们创造能力的延伸。人们的语言创造思维和创造能力，在信息技术的引领下实现了一次重大跨越。网络语言不仅仅是时代的产物，也是科技的产物。信息技术带来的生产与变革，大大提升了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拓展了人类的视野。而这些，都是创造性思维发生和发展的根本前提。从现实来看，新的传播技术在催生新的传播和信息传播模式的同时，也在塑造新的语言、新的文化和新的社会群体。另外，人们创造网络语言的同时，也存在某种思维差异。

在计算机面前思考与用笔和纸或打印机思考有什么不同？计算机并不仅仅是你指尖上的另一种工具。它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环境，一种让思维嗅到不同气息的信息环境。计算机的氛围属于信息富有的世界，但这个世界不久便成为一个受信息污染的世界。……非语言工具，如橡皮擦，的确在我们自己与语境嵌入的母语之间插入一段距离。是啊，用橡皮擦会以各种无可名状的心理对我们产生影响。教师都懂得，让学生使用橡皮擦是写好

^① [美] 尼古拉·尼葛洛庞蒂：《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2页。

作文的一个重要步骤。一种自我批评的态度,意味着我们正在开始对自己的措辞和思想作出评估。^①

随着新媒体技术发展,人们最终让其思维粗俗的一面展现出来。当然,网络语言有粗俗化的趋向只是病症,病症在于当今浮躁的社会心态,更容易在虚拟的网络空间汇集戾气,继而转化为粗俗的宣泄式表达。

前几天看了《老炮儿》,它里面也是有各种骂人的粗俗的话。有人说《老炮儿》里面的语言是老北京的,但其实老北京人一般不爆粗口的,就是骂人也要骂得优雅,就是这个姿态要好,不用脏字眼。你看老舍的作品当中,哪怕是底层的那种拉人力车的,做各种低下的职业的人,他们说话其实也是不带脏字眼的。当然也有带脏字眼的人,那都是坏人。今天,好像你要做好人,也得带脏字眼,因为脏字眼好像代表你是一个性情中人。反而说话像我们以前这么文雅的,感觉有点假,人家就觉得你做作,可能是伪君子。^②

三、虚拟网络空间的“语言暴动”文化

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创造了“语言能量”观,“按照庞德的解释,语言的活力是指词语在结构中与其他词语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所产生的新的关系,从而获得新的品质,这就给语言带来了‘活力’。他又说,词语之间能够‘传电’,能产生和互相生某些品质”^③。也就是说,词语不断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新的结合,使得新词、新义层出不穷,形成所谓语言产生的“活力”。尤其在平民狂欢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已往主宰媒体的精英语言被覆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网络语言。它来自网络公众,拥有语言的创新,一个不期而然的热点话题,忽然以暴发的方式,一夜之间在网络上传播弥漫。可以说,网络语言是一种社会方言,流行的语言和工业术语,已经成为一种语言变异现象。

① [美] 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金吾伦、刘钢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② <http://cul.qq.com/a/20160117/004755.htm>。

③ 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互联网空间被一种负面情绪所笼罩着。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百姓们感觉到的生活压力却普遍增加。当然，网络上所反映的这些问题，不少是网民的集体宣泄。正如学者窦丽梅指出：

在虚拟的语境中，语言面对的时空不再具体，语言成为一种直接的游戏，语言的交流和语言接受不再神圣。在无穷无尽的语言游戏中，语言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和交流，信马由缰、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成为网络语言链接的最为突出的游戏特征。^①

虽然网民们无拘无束的语言表达带有游戏特征，但是其情绪宣泄通常表现的强烈和真实，即便是一种不良情绪反应，也可以代表当今社会的某个方面出现问题。因此，我们对于互联网上网民直接表达的欲望，不仅有过一段时间的激烈批判，而且也获得人们赞扬，刺激过许多人反思。面对互联网已经把庞大的群体进行无缝链接之后，实际上流行语便脱离了原先语言的范畴，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甚至价值观。如果我们再对流行语进行无谓的批评已变得毫无意义，应该从流行语中寻找能够反映公众情绪的方向，这也是政治、文化、商业、经济活动所要想达到目的必然。

当互联网流行语特质凸显的时候，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态度均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名利的显性追逐，人们的愿望经过互联网的集结、洗练，最后变为一个个关键词。而这些关键词把线上与线下的人，连成了一个完整的个体，因此，网民是人民群众的重要组成部分，网民的意愿与声音往往代表人民的意愿与声音。

在传播过程中，网络流行语往往呈现出下降的轨迹，惊人的速度将被淘汰，它可以说是流行语保鲜的秘诀所在。从更迭来看，网络流行语的寿命取决于人们思维转变的快慢，反映了公众在不断寻找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利益，这与文本语言积重难返而难以从我们的思维里根除不一样。传统舆论场域内往往缺乏个体发言带来的影响力，而互联网的公开性为人们提供了表达自由机会，每当一个流行语席卷网络时，意味着网民“声音风暴”最强烈的时候。

^① 鲍宗豪主编：《数字化与人文精神》，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57、360页。

第一章 互联网场域内的语言传播现状

第一章

互联网场域内的语言传播现状

第一节 网络使用的规模与使用群体特征

一、网民的规模

“语言，从其本质上说，是一种符号体系。因此网络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泛指网络传播的一切表现手段，网络上的言论、网络中特有的支离破碎的语言表达，网络技术所带来的文化、思维方式的变化，网络上所使用的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字等等”^①。当今世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也进一步深化，从基于信息获取和沟通娱乐需求的个性化应用，发展到与医疗、教育、交通等公用服务深度融合的民生服务，推动了我国网民规模的增长进入稳定期。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6.8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0.3%，中国居民上网人数已过半。其中，2015年新增网民3951万人，增长率为6.1%，较2014年提升1.1个百分点，网民规模增速有所提升。^②



图一 中国网民规范和互联网普及率

(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6年1月)

① 刘海燕：《网络语言》，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7页。

②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6年1月，第37页。

随着新一轮的传播技术革新与智能手机的普及,推动一个崭新的传播时代到来。2015年,我国个人互联网应用发展迅速,除论坛/BBS外,其他应用的用户规模均呈上升趋势。在个人应用方面,移动互联网对网民的个人生活方式影响进一步深化,融入即时通信、搜索引擎、网络新闻客户端和社交媒体等应用服务,并且用户规模一直保持稳中有升的趋势。



图二 2014—2015年即时通信和手机即时通信用户规模及使用率

(来源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5年中国社交应用用户行为研究报告》,2016年4月)

从2013年开始,搜狐、网易、腾讯等公司对微博的投入力度陆续消减,使得微博整体市场进入洗牌期,用户渐渐向新浪微博迁移和集中。2015年上半年,微博用户中,新浪微博的用户占69.4%,从1到5级城市的使用率都在65%以上,形成了新浪微博一家独大的格局。2011年,腾讯微信的社交媒体属性逐步获得市场的认可。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作为新兴的信息发布与传播、分享与获取的平台,成为当下移动互联网的热门应用,从而间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网络社会只是现实社会中人们彼此互动联系的特殊场域,是人类社会本身再生产出来的一个特定的人类活动空间,是人类社会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①

二、群体结构偏年轻化

从群体结构看,网民年轻化成为网络用户主力,推动了网络语言发

^① 郭玉锦、王欢:《网络社会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展,而青年亚文化又成为网络语言文化主力军。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以10—39岁群体为主,占整体的75.1%;其中2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高,达29.9%,10—19岁、30—39岁群体占比分别为21.4%、23.8%。与2014年底相比,10岁以下低龄群体和40岁以上高龄群体的占比均有所提升,互联网继续向这两部分人群渗透。



图三 中国网民年龄结构

(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6年1月)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时期,人们在多元价值观的冲击下陷入一片焦虑和迷茫之中。特别是青年人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对美好生活的充满向往,而又无奈于现实中学业、爱情、工作、事业的种种压力,迫使他们需要找到发泄的出口。对此,他们极力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可因自身力量薄弱在无力改变的社会现实面前,通常选择用语言去戏谑、调侃社会现状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无奈。“每个字眼的背后都是一种曲线的意见表达,……。”“曲线表达”背后的网民多为年轻人,思想活跃、渴望交流。他们呼吁政治生活的透明,为民众争取知情权,体现了强烈的舆论监督意识。^①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日常生活中不少年轻人成为一代“低头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自然交流显得日渐缺失。不少媒体对“低头族”年轻人进行了报道。

(1) 近年来,各类智能手机功能越来越强大,俨然成为口袋里的“移动小电脑”。然而,不知从何时起,生活中的“低头族”“刷屏党”汹涌来

^① 《网络热词折射民生民情民意》,《深圳特区报》2009年8月4日。

袭：他们上课不看黑板，走路不看红灯；拇指在屏幕轻划，“无心它顾，分秒必争”。（《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5月16日）

（2）随着移动网络的发展和手机功能的拓展，手机已然成了现代人的必需物品，并由此造就了新一代社会群体——低头族。（《南方都市报》2015年7月24日）

（3）警方提醒：冬季是小偷作案高发季，而公交车上的“低头族”和老年人是小偷最容易下手的目标。（《齐鲁晚报》2015年11月11日）

（4）在信息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患上了手机上瘾症，变身低头族。法国摄影师通过诡异照片展示手机上瘾现象，照片中人脸如同被吸入了手机屏幕。（光明网2015年11月12日）

从上述来看，网络“低头族”是对群体属性和身份特征的强调，也是网络群体上的年轻化表现。正如英国学者赫德森所看来，这似乎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象：“在我们的想象世界里，有一个社会，它是通过某条自然疆界明确划定的，在任何方向上都不能通行。拟构这条疆界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证没有其他社区的成员携带自己的语言加入到该社区里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该社区的成员永远不离开那里，也永远不把他们的语言带到其他社区里去，以免使语言和社区之间的完美一致性变得复杂化。”^①

三、网络语言传播的狂欢与反抗

互联网空间从来都没有脱离真实世界，网络社会只不过是现实社会的延伸。^② 当互联网兴盛之初，许多网民的使用网络语言是为了表达其对新闻事件本身怀疑或不满的态度、渴望获知真相的心情，虽然多是以调侃戏谑的方式出现，但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曲线救国”的思路，最终目的是为了讨个说法。然而随着网络流行语的广泛传播，网民群体中往往会出现“鱼龙混杂”的现象，一些网民不再关注流行语背后的深层含义，而是以娱乐的姿态来使用这些网络流行语。

在网络时代符号消费和娱乐至死的精神主义影响下，网民的娱乐心态

① [英] 赫德森：《社会语言学》，卢德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② [美] 丹·希勒：《数字资本主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9页。

占据上风之后，那些与网络流行语相关的新闻背景往往被抛到脑后，意味着最初针对新闻事件建构的意义被消解，产生了“过度阐释”的“话语狂欢”现象。而这种“话语狂欢”现象使得严肃的事情被过度娱乐化，遮蔽了值得认真关注的真相、淹没了对相关社会现象的理性思考，在较大程度上削弱了网络流行语传播的积极意义和价值。对于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来讲，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人都能注册 ID，并能够表达自己观点，“当你的粉丝超过一百，你就好像是本内刊，超过一千你就是个布告栏，超过一万，你就好像是本杂志，超过十万，你就是一份都市报，超过一百万，你就是一份全国性报纸，超过一千万，你就是电视台，超过一亿，你就是 CCTV 了。”^①

伴随着互联网而来的各种思潮冲击，稳定的价值观形成出现困难，对现实生活有诸多无奈，但又无力改变，于是靠一种自我调侃获得超脱。2010 年，河北大学发生李刚车祸案，使得网民关注的“我爸是李刚”网络流行语而走红，一度因其引爆公愤而推动了案件调查的发展。然而，随着“‘我爸是李刚’造句大赛”的举行，许多网民将事件的注意力转移到造句活动中去，投入极大热情制造各种版本，以获得搞笑戏谑的效果。尽管这仍不失为一种关注事件和抵抗残酷现实的方式，但实际上已经滑入一种略显消极的状态，并且在大规模的“话语狂欢”之后，又剩下多少真正将此事关注到底的人？



图四 “我爸是李刚”

(来源于百度指数)

尽管这些数据实难以统计，但是不得不承认随着新的热门新闻事件的

① 《微语录》，《新周刊》2010 特刊。

产生、媒体报道重点的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很大程度上会从旧的热门新闻事件中退出来，这也是信息时代难以避免的一种注意力无法持续放在某一个信息上的现象。随着网络流行语在网络空间里广泛传播，使其负载的文本意义能被持续复制，尤其在宣泄情绪、抗衡权威的快感体验中，人们要不强化意义本身，聚集民意，扩大舆论影响力；要不消解词语本身意义，只剩下戏谑恶搞，削弱其拥有的积极的传播价值。

第二节 网络语言传播的创制形态

随着互联网技术革新及媒介发展，网络语言成为一种新的传播形态。这些语言的传播形式从线上到线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除了网络语言的易读性、调侃性、幽默性外，还带有一种亲近性味道。由于互联网具有匿名性的特点，网民多半是隐藏自己的真实性特点，所以流行语形态给予这种隐匿性提供了时空的联接方便，使得网民的造词速度超过传说中的仓颉造字，满足了其沟通的好奇心需要。

互联网场域内的语言传播形态已经构成当今中国的一种特殊形态。从国家领导人到黎民百姓均在创造及运用网络语言，使得这些词的原义超过来源的限定，如“互联网+”“亲”。词已经变成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日常词汇。人们每时每刻创造的词语如波涛汹涌的潮水一样，呈现出一个潮起潮落的规律，循序渐进地改变着他们的日常生活轨迹及其工作的运作方式。当然海量网络词汇所创造的多半如流星一样飘过，真正能够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词语，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政策法规及领导人传播的流行词语

孔子云：“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把立言与立德、立功并列为人生三不朽。在网络时代，中国拥有6亿多网民，创造网络词语并不是难事，而难的是创造出来的网络词语是否广泛流行。在当今社会，经典语言经过领

领导人传播成为风靡全国的魅力语言，如习近平同志的“习氏语言”。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及其运用的流行词语，如“中国梦”“正能量”“APEC 蓝”“新常态”“底线思维”“点赞”“一带一路”“我个人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等。

关于网络语言“点赞”，本源于社交化媒体“点赞”功能的一种语言表达行为。随着网民的广泛使用社交化媒体，点赞功能越来越成为其日常行为习惯，后引申为表示赞同、喜爱，往往送出和收获赞的多少、给予偏好等，在某种程度能反映出你是怎样的人以及处于何种状态。因此，通过点赞语言的背后，反映出网民自己对某件事、人物喜爱的表达。

当然，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仅重视互联网语言，而且在不同场合巧妙地运用网络语言的表达方式，被广大网民亲切称之接地气。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新年贺词中运用了不少网络语言，如“我们的各级干部也是蛮拼的。”“我要为我们伟大的人民点赞。”这也是国家领导人首次在新年贺词中运用网络语言。网友们称赞习大大很潮很男神，说“第一次听到这样亲和、接地气的新年贺词”。习氏语言获得众多点赞，更让我们看到他和人民贴得近，想得近，真正做到了共振共鸣。

据《新京报》统计，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主持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对中外文艺名家大量使用“点赞”，多达112位。

按照国别，新京报记者将112位文艺工作者分类梳理如下：

中国：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屈原、王羲之、刘勰、李白、杜甫、李绅、范仲淹、苏轼、黄庭坚、陆游、辛弃疾、关汉卿、文天祥、曹雪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聂耳、冼星海、梅兰芳、齐白石、郑板桥、徐悲鸿、贾大山

古希腊：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

俄罗斯：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肖洛霍夫、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拉赫玛尼诺夫、列宾、普列汉诺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乌兰诺娃

法国：拉伯雷、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

大仲马、小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萨特、加缪、米勒、马奈、德加、塞尚、莫奈、罗丹、柏辽兹、比才、德彪西、福楼拜

英国：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雪莱、济慈、狄更斯、哈代、萧伯纳、透纳

德国：莱辛、歌德、席勒、海涅、巴赫、贝多芬、舒曼、瓦格纳、勃拉姆斯、雅斯贝尔斯

美国：霍桑、朗费罗、斯托夫人、惠特曼、马克·吐温、德莱赛、杰克·伦敦、海明威

印度：泰戈尔

意大利：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

西班牙：塞万提斯

可以说，随着互联网在党和政府的政务工作中发挥日益突出的作用，网络语言也以其鲜活的时代性和旺盛的生命力迅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聚集了民情，促进了沟通，顺应了民心，深受广大群众普遍欢迎。所以，领导干部提高网络语言的表达艺术水准是融入信息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谋事理政的必然要求。其中，党和国家领导人这类网络语言艺术的使用中创新了信息时代下领导干部的领导模式与艺术，彰显了亲民、爱民、为民的新形象。

党和国家领导人创造及其运用的词语已成为网民及其人大代表委员所聚焦的语言生活热点。据泽传媒、人民网、广东卫视《广东新闻联播》共同发布“2015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关注”十大热词榜”。其中，“新常态”一词颇受网民关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第一次提及“新常态”。11月9日，他在北京举办的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全面阐释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点，即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习近平指出，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此后“新常态”一词扩展到政治、外交等各领域，获得地方省市的热烈响应，也受到国际媒体的热捧。